

《战争史研究》专辑《日本帝国海军兴亡史》已上市。全书共两册，每册240页，上下两册定价60元。本增刊全面讲述日本帝国海军八十年荣衰兴亡的全过程。另随书赠送《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海军战舰全名录》工具手册（32开，128页），收录二战日本海军各型舰艇图片及数据。详细情况敬请垂询本刊邮购部（010-88560080）

上册目录：

菊与锚
从浪速到吉野
菊纹龙旗之战
三景舰始末
走向战争的道路
帝国的重组
六六舰队案
鹰与鹤的较量
八八舰队幻梦记
魅影危机
逆天而行
恶魔自东方来（上）

下册目录：

恶魔自东方来（下）——奇袭珍珠港
“不沉战舰”败北记——马来海战始末
从爪哇海到印度洋——联合部队的奔袭作战
“再见，帝国”——从珊瑚海到中途岛
熔炉瓜达尔卡纳尔
宿命铁底湾
决胜拉包尔
马里亚纳猎火鸡——1944年马里亚纳海空战
“盖世无双的海战”——1944，莱特湾
神风·落日——日本帝国海军的末日

WAR HISTORY STUDIES

第二次世界大战

航空母舰

（上、下）

刘怡 著

《战争史研究》2009年增刊《第二次世界大战航空母舰》上册已出版，下册即将上市。本书上册收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及英国海军的主力舰队航母、轻型航母、护航航母及计划舰的发展始末、战争经历、详细数据、线图及众多珍贵照片；下册收录日、法、德、意、苏等国的航母及航母发展计划，二战世界各国海军水上飞机母舰，以及二战各国海军航空兵主力舰载机介绍。全书图文并茂，极富收藏和查阅价值。本书每册250页，单册定价38元。详情敬请垂询本刊邮购部（010-88560080）

责任编辑：哈斯朝鲁

封面设计：张长



1882—1918 年塞尔维亚王国的国旗和国徽。国旗采用红、蓝白三色，即基于俄罗斯国旗的“泛斯拉夫色”（实际上其构图正是俄罗斯国旗的 180 度反转版本）。国徽中央为白色双头鹰，沿用自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标志，象征该国教会与东罗马帝国的联系；中央为红色盾牌和白色十字，四角是四个花体西里字母 C，代表“圣萨瓦，塞尔维亚保护神”（Sveti Sava Srpska Slava）之意



1876—1918 年的黑山国旗和国徽。国旗构图类似塞尔维亚国旗。国徽为白色双头鹰，意义与塞尔维亚国徽相似，象征该国统治者的教会起源。中央为《圣经》中象征基督最后胜利的狮子（犹太的雄狮），也与威尼斯共和国国徽上的圣马可雄狮相似（黑山在历史上长期受威尼斯影响）



1922—1945 年的南斯拉夫王国国旗和国徽。国旗的三色同样来自“泛斯拉夫色”。国徽构图基于塞尔维亚国徽，双头鹰胸部盾牌上的图案分别代表塞尔维亚（左上）、克罗地亚（右上）和斯洛文尼亚（下）三个地区



“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国旗和国徽。1848 年起克罗地亚就用红—白—蓝三色旗作为自己的旗帜。红白格子图案从 10 世纪起就是克罗地亚王国的传统标志，其颜色代表克罗地亚人祖先居住的红克罗地亚和白克罗地亚地区（均在今波兰南部）。“U”代表“克罗地亚独立国”的乌斯塔沙运动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传统旗帜和纹章（14 世纪波斯尼亚公爵斯蒂芬·武科契奇的纹章，二战中德国武装党卫军第 13 “圣刀”山地师的徽章就是取自该图案）

ISBN 7-204-04651-X



9 787204 046515 >

ISBN 7-204-04651-X

K · 391 定价：15.00 元



从塞尔维亚到塞尔维亚

02—54

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中）



前进，阿斯卡里！

55—93

保罗·冯·勒托—福尔贝克和他的东非战争



G.I.

94—109

美国陆军伙食发展史（下）



战研书摘

祖国（五）

110—128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45号

《战争史研究》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88561472

邮购部电话：010-88560080

邮政编码：100037

编辑部信箱：war.history.studies@gmail.com

（邮购、购买过刊等事务请咨询发行部）

如有错页、漏订、脱页等现象，请与本刊发行部联系调换

从塞尔维亚到塞尔维亚

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二）



○ 阎京生

“为我保卫南斯拉夫”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这个名称虽然听起来冗赘松散，但它却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这个南斯拉夫人的统一王国是由塞尔维亚政客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共同协商成立的，但是新国家却被掌控在塞尔维亚激进党及其领袖帕西奇首相手里。从1919年新王国成立，直到1941年德国人入侵，在这二十二年的时间里，由非塞尔维亚人担任政府首脑的时间只有五个月（1928年，斯洛文尼亚教士科罗舍茨）。南斯拉夫王国关键性的政府高官、大臣、外交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几乎全是塞尔维亚王国1912年时的原班人马。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虽然也参加了各届政府，但在内阁中只是担任花瓶一样的陪衬角色。

作为南斯拉夫王国立国基础的1921年宪法，在表决时有五分二的议员拒不出席，以示抗议。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当时坚决要求实施联邦制，但是归于徒然。克罗地亚民族运动领袖、农民党主席斯蒂芬·拉迪奇流亡国外，回国后又被投入监狱中，他的政党

也被帕西奇首相解散。1926年帕西奇死后，拉迪奇再度活跃于南斯拉夫政坛，要求“普雷恰尼”地区——“普雷恰尼”这个词在字面上的意义是“大河（萨瓦河）彼岸”，实际上则指曾经属于前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波黑、斯洛文尼亚和伏伊伏丁那诸省——的人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腐败的贝尔格莱德中央集权政府”。

尔后两年里，克罗地亚议员在国会内全力阻挠塞尔维亚人提出的任何议案。1928年6月20日，这场政治争议达到高潮：在贝尔格莱德的斯库普什丁纳（国会）大厦里面，来自黑山的议员普尼沙·拉契奇掏出一把手枪，把拉迪奇的侄子和另一名克罗地亚议员当场打死，其他三人受重伤，其中包括拉迪奇本人。凶手是个泛塞尔维亚主义者，跟一些密谋集团有牵连。国王匆匆赶往拉迪奇的病床前探视，从而暂时制止了危机的恶化，但这次危机已经不仅是过去十年中南斯拉夫每年要发生两次的那种内阁危机，而是一次影响国家前途的危机。七个星期后拉迪奇最终去世，而凶手又因拥有议员豁免权而被释放时，南斯拉夫已经处于分

裂的边缘。

大体上来说，当时的南斯拉夫分为两个营垒，以塞尔维亚人为一方，以“普雷恰尼”地区的人为另一方，分别以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为中心。分裂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上比较幼稚的塞尔维亚人独占政权，他们不能胜任治理一个比1914年的塞尔维亚突然大了两倍的国家的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战后迅速的领土扩张就意味着应当以强权殖民来施展权威，派遣宪兵、教师、屯垦退伍军人和税务官前往新征服的偏僻行省。在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上，贝尔格莱德政权采取严厉的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政策；马其顿人和黑山人被认为是“第二等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则是“待同化的塞尔维亚人”。非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境遇则更为悲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为了得到较好的待遇，纷纷改成塞尔维亚人的姓名，学习塞尔维亚语，争相“塞尔维亚化”；巴纳特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则受到严酷镇压，教师、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纷纷逃出国境，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供塞尔维亚人享用。

1920年8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和

南斯拉夫缔结了一项防御同盟条约，规定一旦匈牙利向两国发动进攻，或者哈布斯堡王朝在布达佩斯复辟，盟约立即生效。翌年春天，罗马尼亚也加入了这个盟约。匈牙利的一个新闻记者轻蔑地在他的新闻报导里把他所鄙夷的这三个邻国称为“小协约国”，结果这个名称却一直延续下来。

罗马尼亚尚且是南斯拉夫的友好邻邦、“小协约国”中的一员，其情况尚且如此，属于“前敌国”匈牙利的马扎尔人遭遇更可想见。大地主和大贵族纷纷逃往国境北边，留下来的贫苦匈牙利劳工和农民被限制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南斯拉夫国会和政府里也没有自己的代表。不过，人口比他们略多的日耳曼人受到的待遇却不那么严厉，这也许是因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们看上去不像马扎尔人那样“危及国家安全”。但是，无论是马扎尔少数民族还是日耳曼人，都没有与塞尔维亚人统治的南斯拉夫国家和解，他们的怨恨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特别凶狠的方式发泄出来。

在1928年的那场政治大危机中，同属于塞尔维亚人阵营的还包括波斯尼亚、伏伊伏丁那和克罗地亚的前奥匈帝国塞族臣民，这一阵营的口号是统一：一个国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过，当时的政治阵营划分并不那么简单，在塞尔维亚人阵营里还包括一些认为有利可图而投靠中央权力的机会主义分子，比如斯洛文尼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由于具备高超的政治技巧，斯洛文尼亚人在这个国家里获得了高度的自治。这一方面是由于语言上的好运：既然塞尔维亚官员在欺压91%的臣民时，一口漂亮的普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已经够用，那么就绝不会有哪个塞尔维亚官员会去为了欺压剩下的那9%而专门去学另外一门语言。此外，斯洛文尼亚人在奥地利统治时期就具备较高的教育程度，而且有了一些行政经验，因此在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居民大半是文盲的国度里，斯洛文尼亚人经常被任命担任政府或银行的高级职务，所以他们一心一意地支持中央集权制也就不奇怪了。

另一方面，克罗地亚曾经是匈牙利王国的主要工业地区和商业活动中心，南斯拉夫成立之后，塞尔维亚统治者把商业中心从萨格勒布迁到了贝尔格莱德，而且贝尔格莱德政府还向他们征收重税，在宗教活动和文化教育中对其实行歧视待遇，禁止他们在国家机关中像塞尔维亚人一样担任要职，从而引起了不满。在克罗地亚人的阵营中，还包括南方饱受欺压的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以及部分黑山人。他们的口号是和睦：联邦主义，国王只有一个，但像前奥匈帝国那样分为几个互相联合而又各自独立的国家。至于北方的马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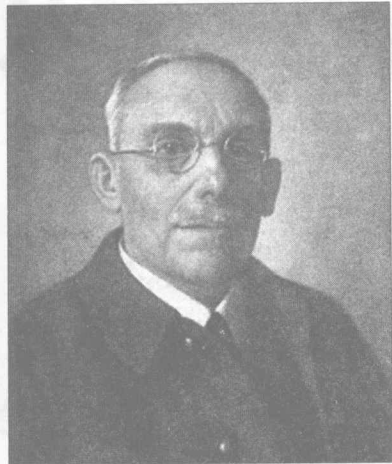
尔人和日耳曼人，则在望眼欲穿地巴望着自己的匈牙利和德意志祖国，根本不愿意继续留在南斯拉夫王国之中。

1928年12月，斯洛文尼亚教士科舍茨领导的联合政府倒台，再也找不到愿意出来组建政府的政党和个人。南斯拉夫的国家机器已经停止运转，亚历山大国王认为国家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为了挽救政治危局，减少国家分裂带来的苦难，他在1929年元旦那一天召见了克罗地亚农民党新任领袖马切克博士和普里比切维奇博士，向他们询问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从南斯拉夫和平地“切除出去”的意见：像1905年挪威经过友好协商后从瑞典分离出去一样，在王国的中部从北到南划定一条边界，南斯拉夫政府把军队和官员撤到此线以东。这条分界线有些类似1915年协约国对塞尔维亚提出的领土补偿界线，把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东南部的半个达尔马提亚留给塞尔维亚，其余原属奥匈帝国的“普雷恰尼地区”（但是不包括斯拉沃尼亚最东端、夹在多瑙河和萨瓦河之间、一直延伸到贝尔格莱德西部的斯雷姆地区，因为当地居民全是塞尔维亚人）则任其独立。

但是，克罗地亚民族领袖们经过研究认为，克罗地亚人想要的是与塞尔维亚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而非自己组成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普雷恰尼”地区脱离南斯拉夫，那么不仅要面临斯洛文尼亚人的问题，而且还可能被意大利和匈牙利所瓜分。所以他们不愿意从南斯拉夫分离出去。国王询问他们的计划，得到的答案是废除中央集权、实施联邦制。亚历山大国王随后把这个计划提交给塞尔维亚各政党的领袖，但由于后者顽固地拒绝修改宪法，国王只得在1929年1月6日宣布解散国会，废除1921年宪法，对新闻自由加以限制，一切权力归于国王，由他和以日夫科维奇将军为首的内阁部长会议共同掌握行政权——自1913年亚历山大（当时还是塞尔维亚王储）与“黑手会”发生冲突以来，属于“白手会”的这位将军便是他的亲密朋友。

在亚历山大国王看来，废除宪法只是权宜之计，在接下来的短暂时期里，国王将充当国家的托管人，促进民族和解，直至各方的感情冲动平息下来为止。但是，在宣布国王独裁同时颁布的几项法令，却使人看清了新政权的性质：凡是从事恐怖活动、危害治安或宣传共产主义的人一律判处死刑或20年徒刑；地域性的或宗教性的政党一律解散；非经政府许可不得结社；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和专区（当时南斯拉夫的一级行政区）议会一律解散。出版法经过修改，变得更加严格，实际上剥夺了全部新闻自由；新通过的法院组织法律规定国王有权撤换法官，这就把司法系统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德拉科·马切克(1879—1964)，出生于萨格勒布附近的一个斯洛文尼亚—捷克移民家庭，参加了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组建，1928年在拉迪奇遇刺后成为该党领袖。二战初期被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关入集中营，后被释放，软禁在家中，战争末期被劫往国外，先前往法国，随后在美国定居，在南斯拉夫实行共产主义政体后在国外重新组建了克罗地亚农民党



安特·帕韦利奇(1889—1959)，克罗地亚“乌斯塔沙”运动创始人之一。出生于黑塞哥维那地区，年轻时就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致力于建立独立而“纯净”的克罗地亚人国家。1921年被南斯拉夫当局逮捕，后流亡国外，接受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资助，从事反南斯拉夫活动

国会解散之后新成立的“最高立法会议”毫无立法权，唯一的作用是认可政府颁布的法令。

最后，亚历山大在当年10月3日又颁布了改组国家行政体制的法令，南斯拉夫原有的三十三个专区全部被废除，代之以“巴昂辖区”(省)，全国一共设立了九个巴昂辖区，大多数以河流命名，此外还有一个贝尔格莱德专区。在这个法令里，国家的正式名称也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

尼亚人王国”变成了“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危险的刺激性名词一律被废除。

如果说这些独裁法律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独裁政体的话，那么以日夫科维奇将军为首的“内阁部长会议”则表明国王的个人独裁并没有真正摆脱“由塞尔维亚人当霸主”的政策。亚历山大国王倒是试图从各民族中挑选人才来组成内阁，但他找的克罗地亚人只是一些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既不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又不能为克罗地亚民众所接受，因此克罗地亚人同贝尔格莱德离心离德的状况越发严重。克罗地亚农民党和共产党同样横遭迫害，一些克罗地亚政治家逃往日内瓦，准备了一份有关克罗地亚状况的备忘录递交给国际联盟，其中列举的不经审判随意监禁和使用酷刑的证据令西方媒体哗然。他们随后又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吹克罗地亚自治，但不支持采取恐怖行动或同南斯拉夫的敌国合作。

还有一些激进的克罗地亚政客则决心向南斯拉夫的天然敌人——匈牙利、意大利和保加利亚——争取援助。在这一类克罗地亚人里面，有一位是“克罗地亚权利党”的代表安特·帕韦利奇，国王发动政变的第二天，他在萨格勒布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其成员发誓要为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而战斗。这个会社的参加者自称“乌斯塔沙”(Ustase)，意为“揭竿而起的人”。他们不同意克罗地亚农民党的议会斗争路线，认为只有暴力与恐怖才能最终推翻塞尔维亚人的暴虐统治。帕韦利奇在1929年初外逃，最初前往维也纳，在那里同保加利亚人和东南欧最富盛名的恐怖主义团伙——“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接受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武器与金钱援助，最终前往意大利定居。在派人暗杀了居住在匈牙利的对手和竞争者奥古斯特·佩尔切茨之后，帕韦利奇成为乌斯塔沙运动至高无上的“首领”。

亚历山大国王统一南斯拉夫各民族的计划有怎样的可能获得成功，这一点如今已经难以估量，但是在1929年和1930年这段时期里，在南斯拉夫的大小监狱里塞满了克罗地亚等族“共党分子”或“里通外国分子”的情况下，显然希望渺茫。1930年9月6日，他强加于南斯拉夫臣民的统一又进了一步：在这天的阅兵典礼上，塞尔维亚部队

放弃了久负军事盛誉的塞尔维亚军旗，接受了蓝白红三色的新南斯拉夫军旗，接着又宣布每年6月28日“维多夫丹节”举办的阅兵式改为11月6日举行。亚历山大国王的意图是要把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感情也像克罗地亚人的民族感情一样彻底打碎，熔于对南斯拉夫的忠诚之中。但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空想，不仅不得人心，反而引起反感。生活在“旧塞尔维亚王国”境内的塞族人被剥夺了自从赶跑土耳其人之后就一直享受的那些政治自由，心中郁积的不满开始显露出来。此外，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开始蔓延到南斯拉夫，1931年4月推翻君主制的西班牙革命又为亚历山大国王提供了一个不寒而栗的先例，因此他在当年9月宣布恢复国会，并颁布了新宪法。

1931年的这部新宪法一直使用到1941年德国入侵为止。它娓娓动听地宣布了一系列自由：免受非法逮捕的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等等等，但每种自由都被局限于“法律范围之内”，而法律又是在国王的独裁统治之下制订的，依然继续生效。法律依然禁止政治结社，因此根据新宪法举行的大选毫无意义，无非是发给选民一张事先定好的候选人名单。塞尔维亚人批评新宪法是独裁政治的一种伪装，“普雷恰尼”地区的人们则把它看作十二年来塞尔维亚化政策的延续，双方都拒绝接受它。塞尔维亚反对党要求废除国王个人独裁，成立代议制政府——这一点他们倒是与其“普雷恰尼”对手是一致的，因此这两派反对力量后来结成政治联盟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1932年，在南斯拉夫境内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贝尔格莱德的大学生上街闹事，喊出了“打倒国王，共和万岁”的口号。甚至一向平静无事的斯洛文尼亚也发生了骚动，驻守马里博尔的卫戍部队军官中还发生了一起“共产党阴谋案”：十几个下级军官和军士试图夺取该城。两个中尉后来携带团队伙食费越境逃往奥地利，其余被告都被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

1932年9月，克罗地亚南部的利卡山区和达尔马提亚山区的饥饿农民也拼死发动起义，他们用从沿海一带走私进来的步枪武装起来，宪兵与军队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恢复了权力，残存的起义者纷纷逃往意大利在达尔马提亚的飞地扎拉(扎达尔)。那年冬天，来自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伏伊伏

丁那的十位知名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政治领袖发表了《萨格勒布宣言》，要求实行民权主义，取消塞尔维亚的霸主地位，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对国家实施改组。面对蜂起的反抗，亚历山大国王的反击是把《萨格勒布宣言》的起草人、以及克罗地亚人领袖马切克博士和斯洛文尼亚人领袖科罗舍茨等政治反对派统统投入监狱。

直到1931年为止，政治上的纷争一直没有阻碍南斯拉夫在经济上的发展。南斯拉夫农业克服了1914至1918年战争的影响，得到显著恢复。由于连年五谷丰登，小麦、大麦、牛羊、生猪、大麻和啤酒花等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一直在上升。由于从德国那里得到了作为战争赔款的机器之后，南斯拉夫的纺织工业也有很大进步。巴黎和会在分配奥匈帝国遗留下来的商船队时，只给南斯拉夫留下了138艘商船，而且多数是小吨位的近海船只，但到1926年，这个数字却上升了一倍。此外，旅游业也繁荣起来，前往阳光明媚的达尔马提亚海滨和风景迷人的克罗地亚古城游览的外国游客与日俱增。到1926年，南斯拉夫偿清了它欠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债务，从而为吸取美英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整个二十年代里，南斯拉夫第纳尔与英镑的兑换比率一直固定在275:1上。

1931年，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终于降临到南斯拉夫的头上。在当年的前六个月中，南斯拉夫的进出口减少了25%，贸易收支出现了2.65亿第纳尔的赤字。国家银行的外国信贷全部用尽，法国提供了利率为7%的10亿法郎援助，用来稳定第纳尔的币值，但情况迅速恶化。当年8月，德国宣布停止偿付赔款，这意味着南斯拉夫将每年减少7亿第纳尔的收入，为此不得不减少公务员的薪俸与退休金，并提高税收。当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南斯拉夫出现了银行挤兑狂潮，人们争相把手中的存款由纸币换为硬币。农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暴跌对南斯拉夫的打击也十分严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南斯拉夫政府不得不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60%的代价将农民的小麦全部收购下来，以免谷贱伤农，但这个过程在执行当中却带来了灾难。政府工作人员未能及时储存购入的小麦，结果大量小麦（价值4亿第纳尔之巨）发生霉变而损毁。另一方面，农民卖小麦得到的不是现金，而是公债券，这些

公债不能用来纳税。

1932年开春之后，局势更是雪上加霜。国内广大地区发生水灾，三万多人无家可归。由于缺乏饲料，国内四分之一的家畜被宰杀，南斯拉夫停止向国外出口牲畜。当年5月，法国左派在选举中获胜，这意味着法国将不再在经济上充当南斯拉夫的后盾。当年春天，政府宣布农民的债务可以延期六个月归还，但后果是各家银行都收紧了放贷政策，农民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在春季这个最需要贷款的时候得到贷款。农民破产，无力购买任何东西，导致零售商跟着破产，接着批发商也纷纷破产，最后又波及到制造商和进口商。南斯拉夫在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终于大难临头，国家的前途处于风雨飘摇的晦暗不明状态。

在这样一种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的时期，获得友好的外部环境就越发重要。亚历山大国王出访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等国，改善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1934年2月，南、希、土三国组成了带有共同防御同盟性质的“巴尔干协约国”。保加利亚虽然不在其中，但这个同盟也不是针对它的，而是针对日益威胁地区和平的法西斯意大利。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还加强了同“小协约国”成员罗马尼亚和捷克的合作，共同抗衡匈牙利和奥地利。

希特勒本人对其他民族的态度，始终同传统的、怀有泛日耳曼主义思想的其他奥地利人的态度几乎是相同的。因此，他对塞尔维亚人的勇敢无畏不禁怀有一定的钦佩之情，曾经多次用赞赏的口吻谈起塞尔维亚人的尚武品质，而戈林将军也在去南斯拉夫旅游

的时候同亚历山大国王进行过多次友好的交谈。纳粹政府对南斯拉夫表现出来的友好态度掩盖了它对中南欧既存秩序的挑战。

1934年5月，南斯拉夫与德国签署了一项贸易条约，对于大萧条之后的南斯拉夫来说，德国愿意灵活地根据南斯拉夫的需要调整其经济政策，而不是像英法一样空谈“保持欧洲秩序的必要性”，因此德南合作无疑更有吸引力。根据贸易协定，德国对南斯拉夫工业的投资显著增加，两国间的贸易很快就翻了一番。德国厂商步步紧跟，为机器设备提供更新，同时使他们的出口商品更适合南斯拉夫的需要，从而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渗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南斯拉夫半数以上的出口商品运往德国，而德国货物差不多也占南斯拉夫全部进口物资的半数以上。作为贸易协定的附带产物，一度蜂拥前往奥地利度假的德国游客转而去南斯拉夫沿海的度假胜地游览，为南斯拉夫带来了宝贵的外汇。

另一方面，法国外交部长巴尔杜希望南斯拉夫能够和意大利和解，以共同对抗新兴的德国纳粹政权。亚历山大国王同意对墨索里尼做出有限的让步，比如说向意大利供应木材，以换取对方不支持克罗地亚恐怖主义分子的保证，但不愿意更进一步同那个穷凶极恶的邻国合作。

1934年10月，亚历山大乘军舰经海路对法国进行访问，以向巴尔杜解释自己的对意政策。10月9日，他在马赛港登岸，在和巴尔杜乘车经过马赛的大街时候被刺杀。凶手符拉多·赫尔诺泽姆斯基被法国警察当场击毙，他来



亚历山大一世在法国马赛遇刺的场景，1934年10月9日。由于当时有摄影师对其访法过程进行拍摄，因此亚历山大遇刺的全过程都被拍摄下来，成为世界政要刺杀史上仅有的几卷现场录像之一



被刺客击中后生命垂危的亚历山大一世



停放在马赛教堂的灵柩，近处是亚历山大一世，远处是法国外长巴尔杜

自臭名昭著的保加利亚“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是其头子伊凡·米哈伊洛夫的司机，也是一名熟练的枪手。赫尔诺泽姆斯基受米哈伊洛夫的指使，去协助安特·帕韦利奇及其乌斯塔沙分子。这起阴谋是由克罗地亚人在意大利策划的，匈牙利则窝藏和鼓励了凶手。巴尔杜也在刺杀中身受重伤，几天后身亡（法国法医后来发现，打死巴尔杜的那颗子弹其实是吓昏了头的法国警察胡乱开枪所射）。法国法庭缺席判处安特·帕韦利奇死刑，但意大利人一直没有把他引渡给法国，而是让他安居在佛罗伦萨郊区的一幢小房子里。接替巴尔杜担任法国外长的赖伐尔急于对墨索里尼做出让步，以换取法意两国联合行动反对德奥合并，因此根本没有提及引渡帕韦利奇的问题。

亚历山大国王生前深信联邦制只会造成分裂，认为只有采取强制手段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但他去世时留下的国家却充满倾轧猜疑，四分五裂，党争之激烈甚至超过议会制度时期，而这正是他当初宣布个人独裁时所要消除的弊端。尽管绝大多数南斯拉夫人反对国王的独裁统治、希望恢复民主，但也对国王的遇刺感到悲愤异常，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敌人眼里，国王是南斯拉夫统一和独立的象征，必须作为眼中钉拔掉。民间立即编出一则故事，说国王在临终时嘱托“为我保卫南斯拉夫”。老百姓不知道的是，国王自己在最近得出了独裁制度已经失败的结论，并且决心回国后恢复立宪政府。

亚历山大的遗体被运回南斯拉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的圣格奥尔基纪念大教堂里。十一岁的王储彼得正在英国南部萨里郡的一所预科学校读书，回国即位，成为南斯拉夫王国的第三代国王——彼得二世。他在1941年9月才满18岁，在这之前，由一个三人摄政委员会代为摄政，即保罗亲王，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医学教授斯坦科维奇博士，以及滨海巴昂特

区的前任长官佩洛维奇博士。后两人并非知名人士，因此实权实际上交给了保罗亲王。

许多塞尔维亚人把保罗亲王看作“外国人”，对他并不信任。另一方面，保罗亲王比亚历山大国王更具备“南斯拉夫人”的特点，反感狭隘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宁愿远离贝尔格莱德，在斯洛文尼亚北部的朱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城堡里安享宁静的生活。保罗亲王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教养，责任感很强，厌恶巴尔干地区的传统政治。他把自己看作王位的临时监护人，无意对王国的体制进行激烈的变更，但是对君主专制和军事中央集权表示遗憾。他把马切克博士和其他克罗地亚领导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放宽了出版审查制度，并且在1935年组建了以塞尔维亚“青年激进党”领袖斯托亚迪诺维奇为首相、囊括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政治家的“民族和解政府”。南斯拉夫军方置身于纷争之外，听任保罗亲王和文职大臣们在政治领域放手进行各种试验，只要不向塞尔维亚最高司令部的真正权力挑战就行。

德国祸

到1936年3月，随着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欧洲的政治局势已经很明朗。虽然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已经看出纳粹德国将是欧洲未来的头号祸患，但不幸的保罗亲王却依然坚持认为希特勒是那么理解别人，戈林将军又是那么慷慨大方、是那么富有同情心、那么饶有风度。当年3月，德国宣布对于从南斯拉夫进口的牛、猪和小麦实行优惠税率，并将这些货物的进口限额提高到4.5亿第纳尔。南斯拉夫则向德国大量订购各种机器、火车头、铁路客货车辆、桥梁建筑材料和其他工业物资。这一年6月，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访问贝尔格莱德时提出大量增加易货贸易，愿意用比国际市场高得多的价格购买南斯拉夫的农产品，不幸的南斯拉夫农民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市场。

这样，德南关系就得到了加强，而南斯拉夫对于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反对也就相应地减弱。直到此时，“小协约国”仍不合时宜地以奥地利和匈牙利为头号敌视对象，三国的总参谋部甚至在1936年夏天煞有介事地讨论了奥托·冯·哈布斯堡大公在维也纳复辟之后的军事行动计划：捷克军队从布尔诺出发，向维也纳进军；南斯拉夫军队从马里博尔出发，取道格拉茨，在维也纳城门与捷克军队会师；罗马尼亚则在后方监视匈牙利的动向。这种小小的、有趣的战争游戏只不过反应了“小协约国”在欧洲和平黄昏时期的不切实际，因



访问法国的南斯拉夫首相斯托亚迪诺维奇在无名战士纪念簿上签名。他在位期间采取亲法西斯政策，意南关系一度非常和谐



幼童国王彼得二世，创作于1934年的画像

为在奥地利的北方，一场真正的灾祸——德国之祸，正在迅速地崛起。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南斯拉夫在斯洛文尼亚地区和德国有了一条共同的边界，南斯拉夫政界和贝尔格莱德的报界对此都心平气和，斯托亚迪诺维奇首相在上议院为这种态度辩护，理由是希特勒是那么真诚地保证新的德南边界“今后不受侵犯”，并且他还得到消息，关于捷德边界，希特勒也宣布了相同的态度，而捷克政府对此感到满意。

当年9月，随着希特勒对捷克的苏台德区提出领土要求，欧洲形势进一步恶化。南斯拉夫的政治家一致认为必须在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之前尽快解决克罗地亚问题，否则到那时克罗地亚人可能发生叛乱，南斯拉夫将遭到肢解。保罗亲王和马切克博士进行了恳切的长谈，双方都同意实行联邦制。新南斯拉夫将由几个自治单位组成，拥有统一的王朝、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外交部，马切克又同意把财政、贸易、邮电和海关交给中央政府。

产生争议的是自治区划分问题。当时南斯拉夫境内能以民族、语言和历史原因要求自治的地理单位共有八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和黑山。塞尔维亚人要求马其顿和黑山必须包括在塞尔维亚这个自治单位内，克罗地亚一方则回应说，如此一来，前哈布斯堡帝国各省，除斯洛文尼亚之外，都应该归他们。这样，南斯拉夫将分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

亚三个大的自治单位。在这个共识上，贝尔格莱德政权和“普雷恰尼”双方进一步讨论其他地区的归属。达尔马提亚（除了最南端的科托尔港之外）归克罗地亚人，这一点双方都同意；伏伊伏丁那地区从种族上来说塞族占大多数，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并入塞尔维亚。

引起争议的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在这两个地方，人口占少数的克罗地亚人愿意并入克罗地亚，人数多得多的塞尔维亚人赞成并入塞尔维亚，而穆斯林则希望实行自治。对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人来说，如果让他们在并入塞尔维亚和实行自治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后者；而穆斯林的态度则是如果不能实行自治，就宁愿并入克罗地亚而不是并入塞尔维亚。这样一来，穆克两族在波黑结成了反塞尔维亚的同盟。

1939年3月，德军开入布拉格，吞并了残余的捷克；意大利则接着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局势至此已经非常清楚，欧洲大战迫在眉睫，保罗亲王现在急于同克罗地亚人达成协议，因为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已经越来越猖狂，并且毫不隐瞒他们要依靠希特勒的力量来为克罗地亚取得“独立地位”的意图。3月9日，保罗亲王的朋友、克罗地亚贵族本贝莱斯侯爵访问罗马，公然对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伯爵（两人是在保罗亲王主持的一次王室狩猎活动中认识的）透露了自己的乌斯塔沙身份，并且说“假如有朝一日通过动员竟使克罗地亚人手中有了武器，他们的枪则自动会向塞尔维亚人开火”。

当年5月，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马

切克博士的特使、有意大利血统的工程师卡内卢蒂前往意大利。他告诉墨索里尼，虽然马切克拒不考虑同贝尔格莱德妥协，但也拒绝发动反对贝尔格莱德的暴动。意大利人则提交给卡内卢蒂一份备忘录，让他转交给马切克。备忘录怂恿马切克博士和他的农民党应当在四到六个月内发动暴动，宣布克罗地亚独立，然后立即吁请意大利军队进驻，以“确保秩序与和平”；接着克罗地亚将与意大利结盟，自立政府，但外交和国防委托给意大利，意大利在克罗地亚驻军，并留驻中将一名，一如在阿尔巴尼亚之情况。稍后意大利再决定是否由意王兼任“克罗地亚国”的最高元首。墨索里尼现在已经沉迷于粉碎南斯拉夫、吞并克罗地亚，他认为此事轻而易举，于是指示通过苏黎世的银行向萨格勒布汇去两千万第纳尔（当时约合45.5万美元）的“革命经费”。

在这种种阴谋威胁下，保罗亲王担心，如果在1939年这个不祥的年份恢复民主制，那么痛恨民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会来找麻烦，因此他力图把民族问题与宪法问题分开，把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与他们的盟友——要求立即恢复议会民主的塞尔维亚反对党分开，希望在不对后者让步的情况下解决前一个问题。1939年8月26日，保罗亲王与马切克博士达成了被称为“斯波拉宗”（Sporazmu）的和解协定，成立一个新的名叫“克罗地亚”的自治巴昂辖区，它由过去的滨海与萨瓦两个巴昂辖区合并而成，并纳入了德拉纳、符尔巴和多瑙三个巴昂辖区的部



正与戈林交谈的南斯拉夫摄政王保罗。摄于30年代后期。保罗出生于1893年，其父亲阿森亲王是彼得一世的弟弟，因此他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堂弟。保罗年轻时曾在牛津大学读书，1923年迎娶英国肯特公爵夫人的妹妹，希腊的奥尔嘉公主。由于他接受英国教育、具有亲西方的立场，因此不被塞尔维亚人信任。1941年保罗亲王被政变推翻，后流亡国外，1976年死于巴黎。

分领土。其人口为440万（当时南斯拉夫总人口1400万），除了16.4万穆斯林和86.6万塞尔维亚人外，其余全是克罗地亚人。此外还在萨格勒布恢复了传统的克罗地亚自治议会，负责除了外交、国防、贸易、运输和公共安全之外的所有事务，并且与国王共享立法权。五天之后，德国入侵波兰。

在“斯拉夫宗”基础上成立的南斯拉夫新政府是一个联合政府，塞尔维亚人德拉戈萨·茨维特科维奇出任首相，马切克博士担任副首相，外交大臣是塞尔维亚的职业外交家亚历山大·钦察尔-马尔科维奇博士。后者对意大利特别谄媚，他毫无根据地宣称巴尔干半岛“并未从任何方面受到威胁”，并在墨索里尼决定观望形势、暂不对英法宣战时，用最热烈的言辞恭维吹捧意大利“明智的非战态度”。南斯拉夫的普通公众则被德国最初在波兰、随后在丹麦、挪威和西欧的闪电战吓得目瞪口呆。

1940年6月法国的陷落，以及9月份德国空军开始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空袭，在南斯拉夫国内造成了普遍的沮丧情绪。虽然南斯拉夫各界对于英国人民一致团结在丘吉尔先生周围坚持抗战而感到高兴，但也意识到在最近的将来，英国不可能送来什么实际的援助。南斯拉夫军队丧失了捷克的斯科达公司这个头号军火供应商，更加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全感。因此，当第一批德国军队以“教官”的名义开入罗马

尼亚领土、希特勒对自己的巴尔干计划已不屑再遮遮掩掩时，南斯拉夫上层人士中的一些机会主义者建议保罗亲王“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接受严峻的事实”——这就是向轴心国屈服的婉转说法。亲西方的保罗亲王把鼓吹同轴心国合作最积极的前首相斯托亚迪诺维奇——1939年初，他和齐亚诺伯爵在贝尔格莱德近郊的森林里打猎，传来意大利法西斯志愿部队在西班牙取得大捷的消息后，斯托亚迪诺维奇竟然振臂高呼“科西嘉！尼斯！突尼斯！”（都是意大利觊觎的土地）——拘禁在一个偏远山村，以免他扮演吉斯林那样的角色。

意大利吞并阿尔巴尼亚后，意大利军队不仅在西北方屯兵于意南边境，而且在南边也有了一个深入巴尔干半岛的桥头堡，同时意大利舰队还威胁着漫长的达尔马提亚海岸线。在1940年的好几个月时间里，人们一直无法断定，意大利为了耀武扬威，究竟是会按照外交部长齐亚诺的意图进攻希腊，还是会按照墨索里尼的意图进攻南斯拉夫。齐亚诺的意见占了上风，1940年10月28日，一支准备不足的意大利军队越过边界，向希腊进犯。希腊英勇地保卫了自己，甚至还打了胜仗。到12月初，希腊军队不仅把意大利人赶出过境，而且已经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地区。

意大利背信弃义的进攻，以及希腊反抗得胜，使得南斯拉夫的舆论更加反对轴心国。南斯拉夫总参谋部受到

鼓舞，有意和希腊联合保卫萨洛尼卡，抵御意大利人。这个港口对南斯拉夫来说很重要，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起，它就是旧塞尔维亚王国的主要出口港，塞尔维亚及后来的南斯拉夫根据条约在这里享有一系列关税特等待遇。柏林曾暗中鼓动南斯拉夫陆军大臣米兰·奈迪奇和陆军最高统帅部的其他一些军官，怂恿他们在希腊人缠身于别处时去占领萨洛尼卡，但是这个圈套太明显了。

在希特勒看来，意大利人的难相处境突出地表明了南斯拉夫与轴心国合作的必要性，他用来诱使南斯拉夫合作的钓饵便是萨洛尼卡，对保罗亲王则许以南斯拉夫的王位——那是他的希腊公主妻子为自己的两个儿子所积极谋取的。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擅自宣战和随后不光彩的惨败甚为恼火，甚至禁止意大利人同南斯拉夫直接打交道，而是亲自出面。1940年11月27日，罗马尼亚加入“三国公约”后仅仅三天，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就在贝希特斯加登秘密会见了钦察尔-马尔科维奇，敦促南斯拉夫接受“建立欧洲新秩序的义务”。

希特勒钦佩塞尔维亚人的英勇尚武，但他也像19世纪末生活在维也纳的其他奥地利民族主义者一样，对塞尔维亚人的倔强和桀骜不驯甚为恼火。他轻视斯洛文尼亚人，寻找一切机会使卡尼奥拉和下施蒂里亚地区“重归德国”；他觉得克罗地亚人可资一用，鼓励他们的分裂主义运动。至于南斯拉夫王国本身，他痛恨这个国家，一提到南斯拉夫问题总是暴跳如雷，极度激动，因为它的出身像他所痛恨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一样，是一个典型的“凡尔赛国家”。

在时局特别凶险的1940年底，茨维特科维奇政府全心一致，真心诚意地希望南斯拉夫能继续奉行中立政策，保罗亲王也是如此，虽然他在情感上是亲西方的。但是事实上南斯拉夫的当权者早就落到了渴望找对方谈判的地步。他们抱住中立不放，希望争取时间，但却根本不知道从何处重新获得武装，也不知道从何处争取盟友。在希腊危机的这个阶段，土耳其人由于保加利亚国王访问德国而特别不安，他们警告保加利亚，如果对方入侵希腊，土耳其不会袖手旁观。他们还向贝尔格莱德提议缔结土南军事协定，保罗亲王不仅拒绝了这一建议，而且还小



心翼翼地把这个消息对所有的南斯拉夫政治家隐瞒起来，继续奉行他那种“两面光”的骑墙政策。

在保罗亲王的这种政策下，一方面轴心国的代理人——乌斯塔沙在克罗地亚的活动越来越猖狂，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也越来越恼火，他们万众一心地痛恨希特勒所主张的一切。由于秉承塞尔维亚人的英勇气质，他们并没有因为法国的土崩瓦解而丧失斗志。老派的塞尔维亚军官们忠于同英法结盟的传统，同时，无论是在高级军官中间，还是在一般人中间，都怀有一种强烈的观念，宁死也不能投靠轴心国，宁死也不能丧失民族气节。这正是塞尔维亚民族自科索沃战役和拉扎尔大公殉国以来的古老传统。

在时局晦暗不明的1940年底，意大利急欲穿过南斯拉夫领土去包围希腊军队的右翼，因此轴心国对南斯拉夫施加的压力与日俱增。保罗亲王和他的顾问们进退两难，既怕轴心国的恐吓威胁，又怕贝尔格莱德发生暴动。他收到了丘吉尔、罗斯福和乔治六世的亲笔信，鼓励他采取反对希特勒的坚定立场。1941年初，罗斯福还把自己的亲信和朋友多诺万上校（战略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父）派到贝尔格莱德来探听舆情。多诺万发现大臣们和主要的政界领袖都人心惶惶，不敢讲出自己的心里话，生怕惹怒德国。丘吉尔在给外交大臣艾登的信中评价说，“保罗亲王的姿态简直如同一个不幸的人和一只老虎被关进一个笼子里，他只求不去惹它，岂不知老虎进食的时间快要到了。”

1941年初，南斯拉夫第一次公开表现出倒向轴心国的倾向。2月14日，茨维特科维奇和钦察尔—马尔科维奇被召到萨尔茨堡去会见里宾特洛甫，还被召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山间别墅去会见元首。在这次会见中，钦察尔—马尔科维奇似曾向希特勒保证过，他的国家曾竭尽全力阻止希腊接受英国援助，现在则准备担保南斯拉夫绝不会成为英国反德政策的工具。于是希特勒言辞温和地建议至今仍保持中立的三个巴尔干国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加入德日意三国公约，并说这是南斯拉夫应有的态度，他希望看到南斯拉夫“在东南欧各国中占据它应有的地位”。可是，就连元首本人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3月1日，保加利亚纵身下了水，在



保罗摄政王1939年访问德国时，与希特勒乘车经过柏林菩提树下大街

维也纳的贝尔维德宫签字加入轴心国，紧接着德国军队就从罗马尼亚开入了保加利亚。3月3日，保罗亲王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访问了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谈了四个小时。保罗亲王看起来代表力量较弱的一方，但是他步步为营，表现得极为顽强。结果，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发现，为了使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公约，就不得不答应它提出的全部条件：对南斯拉夫边界（包括萨洛尼卡港）做出领土保证；轴心国军队保证在和希腊交战期间不得通过南斯拉夫国土（只使用它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军用物资）；南斯拉夫不承担对希腊作战的特别军费。

3月19日，德国通知南斯拉夫，再给它五天时间，要么签署三国条约，要么“承担一切后果”。保罗亲王嗅到了一股强烈的可疑气息，即德国人正在物色傀儡来代替目前的当权人物，因此他下令把亲轴心国的、当时正在软禁中的前首相斯托亚迪诺维奇转移到一个不能为害的地方，以免他推翻软弱无力的茨维特科维奇政府、出面控制局势。在英国和希腊政府的同意下，斯托亚迪诺维奇先是从拘留地送到了雅典，随后又送到了毛里求斯岛，置于英国总督的软禁之下。3月20日晚上，南斯拉夫内阁在贝尔格莱德郊外著名风景区德迪涅的“白宫”——可以俯瞰贝尔格莱德全城的摄政王官邸——召开了极度痛苦的会议，决定在三国条约上签字。三位塞尔维亚大臣提出辞职，另有五位大臣反对签约。

里宾特洛甫对理应是恭顺仆从国的南斯拉夫所表现出的罕见顽强态度既惊又恼，在3月22日向贝尔格莱德发出

了最后通牒：南斯拉夫必须于3月25日加入三国公约，否则它将失去这个唯一的机会。德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冯·赫伦伯爵曾经劝告里宾特洛甫不要施加太多的压力，因为根据当时南斯拉夫人的普遍情绪，茨维特科维奇政府在干了这件不得人心的事之后，很可能就难以维持下去了。但是来自冯·赫伦这种老派的职业外交家的建议，被里宾特洛甫这个香槟酒贩子轻蔑地扔进废纸篓去了。

3月22日，丘吉尔也给茨维特科维奇首相发去了一份极长的电报：“阁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最后将会一败涂地，这是肯定的。英美民主国家已分别宣布了自己的决心，任何审慎而有远见的人都不能对此有所怀疑。德国人心狠手毒，人数只有六千五百万，……英帝国和美国的人民，仅在他们本国和自治领的就有一亿二千万人。我们拥有不可抗衡的制海权……英帝国和美国拥有更多的财富与技术资源，而且它们的钢产量超过世界上其余国家钢产量的总和。它们决心要制止万恶的独裁者们——其中之一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无可挽救（指墨索里尼）……如果这时南斯拉夫自愿落得罗马尼亚的下场，或者甘犯保加利亚的罪行，成为蓄意危害希腊的同谋者，那么它肯定会遭到万劫不复的毁灭。它只能推迟而不能逃出战争的苦难。到那时，它的勇敢的军队将四面受敌，在毫无希望、毫无救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另一方面，如果南斯拉夫军队能及时抓住良机，他们便能得到战争史上罕见的大好机会。如果南斯拉夫同土耳其和希腊站到一起，又获得英帝国所能给予的一切援

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公约，1941年3月25日。握手者为茨维特科维奇（左）和里宾特洛甫（右）。



助（丘吉尔这话真不要脸），那么便可消弭德国人带来的灾祸，并与上次大战一样确有把握地获得最后胜利。我确信阁下是能认清世界大势的。”

保罗亲王收到这份电报之后，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阿瑟·雷恩也紧急求见他。保罗对雷恩解释说，他别无选择，只能签字，否则南斯拉夫将要遭到入侵；在这种情况下，王国又得不到克罗地亚人的支持。保罗亲王还补充说，南斯拉夫军队武器不足，而且大多数还是德国淘汰下来的。当雷恩试图谈及南斯拉夫的国家荣誉时，保罗亲王又气又恨地对雷恩说：“你们大国真残忍。你们奢谈我们的荣誉，而你们自己却远在千里之外！”

3月23日，贝尔格莱德公布了德国三项让步中的前两项，即保证南斯拉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轴心国保证在同希腊作战期间将不向南斯拉夫要求军队过境权。德国大使馆从当天贝尔格莱德公开售卖的各家报纸中注意到，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报纸认为必须顺从德国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德国人来对付意大利，而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报纸则掀起了讨伐的风暴。来自四面八方的抗议书源源涌向保罗亲王，有人威胁说，如果亲王胆敢在三国条约上签字，就要他的命。驻各国的南斯拉夫外交官纷纷发来电报，威胁说准备辞职，停泊在国外港口的南斯拉夫商船船员也宣布如果政府屈从于德国法西斯，他们将不再返回祖国。历史悠久的塞尔维亚陆军军官协会呼吁保罗亲王不要签字，有谣言说一些军事将领已经去了希腊。南斯拉夫的“索科尔”运动^[注]发表声明说，宁可牺牲一切，也不愿丧失荣誉和自由。塞尔维亚东正教会领袖也警告保罗亲王，要他注意全国人民的情绪，结果保罗亲王反而更加害怕德国人了。当天深夜，摄政王的一些亲密顾问仍然试图劝阻保罗，他们说如果在三国条约上签字，将会在国内引发革命，军队也会起义。保罗悲痛地说：“我被逼无奈，只有屈服。”

第二天，英国公使罗纳德·坎贝尔向钦察尔-马尔科维奇递交了抗议照会，英国公使馆里则挤满了希望参加英国军队去和德国人作战的塞尔维亚青年。3月24日晚上，茨维特科维奇首相更换了那些已经辞职的大臣，然后与外交大臣一起启程前往维也纳。由于害怕首都公众的不满情绪，他们是从贝尔格莱德郊外的某个火车站偷偷溜走的，由于铁路工人举行抗议罢工，他们乘坐的火车晚点了。

1941年3月25日，星期二。在一种预兆不祥的阴郁气氛中，在维也纳的贝尔维德宫举行了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公约的仪式，参加这个公约的国家至此已增至八个。另外德国又递

给南斯拉夫代表三份照会，其中两份是关于星期日公布的那两项保证的——这两项保证后来都被希特勒违反了。第三份照会被认为是绝密的，其中提到德国和意大利“不指望南斯拉夫在军事上合作，这种谅解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如果南斯拉夫愿意在军事方面做出贡献，它可以通知其他两国”。签字之后，茨维特科维奇和里宾特洛甫先后发了言。茨维特科维奇显得很痛苦，希特勒的译员保罗·施密特同情地递给他一杯巴尔干的白兰地酒；里宾特洛甫虽然想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做宣传，但他也显得很疲乏而且心事重重，眼皮都耷拉了下来。希特勒决心要使这个仪式显得隆重，因此亲自出席。他盛赞南斯拉夫“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并许诺德国“将永远是南斯拉夫忠诚的朋友”。但有人听到他私下抱怨说，这个仪式看上去完全像一个葬礼。

有三个主要的动机决定了保罗亲王的选择。首先，自从亚历山大国王遇刺之后，保罗亲王在七年以来一直听任他的国家陷入军事上无所准备的状态；而自从捷克斯洛伐克陷落、斯科达兵工厂为德国所占之后，这种无所准备的状态就变得愈发严重。他知道民主国家无力向南斯拉夫或土耳其提供战争物资，他和南斯拉夫总参谋部的将军们也知道，撇开武器装备和训练上的不足这两者不谈，漫长的北部边疆也根本无法防守，因为那里是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敞开的平原。成功防御的唯一希望在于迅速放弃四座主要城市——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苏博提察。但即使如此，前途也很难预料。

魔鬼般地纠缠着保罗亲王的第二个因素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他不安地感觉到，他的人民对独裁政治已经厌恶至极，如今又因发现国家在军事上的无能而怀有满腔怒火，很可能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吸引。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是保罗亲王在1939年同克罗地亚领导人达成的“斯波拉宗”协议，以牺牲克罗地亚人的盟友——要求恢复议会民主的塞尔维亚反对党为代价，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保罗的借口是在1941年9月幼王成年之前，不能对政治体制进行任何的变动。如今顺从民意就意味着摇摇欲坠的茨维特科维奇政府最终垮台，为一个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所代替，而这也意味着独裁制度的结束和民主制度的重建。因此，签字参加三国公约不仅在外交上是决定存亡之举，而且也是亲王保持国内统治权的最后一着棋。

在这段危急时期里，南斯拉夫军方和盟国进行过一系列秘密接触，因为保罗亲王确实不愿意他的国家落入德国掌控之中。可是，英国明确表示，在德国人入侵南斯拉夫、并抵达南部的瓦达河之前，盟国毫无希望向南斯拉夫派遣远征军。他们能提出的唯一建议是入侵阿尔巴尼亚，那里有意大利的军械库，而且防守不严。看来，英国无力分兵增援南斯拉夫，这是各方都清楚的事实。

几个月以来，英国特工一直在对亲英的南斯拉夫空军将领杜尚·西莫维奇将军施加影响，后者曾在1918年第一个率领塞尔维亚军队开入斯洛文尼亚。西莫维奇的司令部坐落在与贝尔格莱德隔河相望的泽蒙，从前一年12月开始，这里就成为反对德军侵入巴尔干、反对保罗亲王政权因循贻误

【注】又叫“鹰社”，1862年由捷克人米罗斯拉夫·蒂尔什创建的青年体育组织，后来传至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俄国、英国、法国、美国，参加者均为斯拉夫人，以体育的形式促进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二战期间，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国的鹰社运动受到纳粹镇压，二战后被东欧各国政府取缔。“索科尔”在捷克语中是“隼”的意思。

的密谋中心了。几个月来，他身边的少数军官一直在讨论如果政府向德国投降就采取直接行动的问题。知道这一计划的仅限于少数可靠的军官，军衔几乎都在上校以下。他们的秘密联络网从贝尔格莱德伸展到萨格勒布、斯科普里和萨拉热窝等主要的空军驻防地点，在首都掌握的兵力包括驻扎在泽蒙、以西莫维奇为司令的空军司令部，王室近卫军的两个团（团长除外），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的一个营，在王宫执勤的一连宪兵，首都高炮师的部分人员，一些士官学校，还有某些炮兵和工兵部队。计划中的起义首领是空军总司令博拉·米尔科维奇将军。

3月26日下午，冯·赫伦从贝尔格莱德向柏林发去电报，说南斯拉夫的局势很紧张，贝尔格莱德四郊的农民来到市区，准备同军官和学生一道反对政府和三国公约，有谣传说一些青年军官正在英国特务的怂恿下策划军事政变，并已获得米尔科维奇将军和西莫维奇将军的支持。当天晚上，茨维特科维奇和钦察尔—马尔科维奇返回贝尔格莱德，一下火车便被警察逮捕，带往西莫维奇的司令部，在那里被迫签署辞职书。那天夜里，英国广播公司的塞尔维亚语广播节目里发表了英国战时内阁成员艾默里的煽动性讲话，呼吁塞尔维亚人“一定要永远保持民族精神”。

几个小时之后，3月27日凌晨2时20分，被《纽约时报》誉为“划破沉沉夜空的闪电”的事件发生了：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和驻扎在泽蒙地区的空军部队发动起义，占领了国防部、警察总部、邮电局、电话局、电台和贝尔格莱德其他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在一些重要路口架起了机枪。军队在果敢的军官指挥之下包围了王宫，王宫卫队没有抵抗，而是打开大门迎接起义军，并立即加入了起义部队。年轻的彼得国王顺着雨水管爬下窗户，逃出摄政者斯坦科维奇博士和佩洛维奇博士的监护。两位摄政者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官员被逮捕。政变者宣布彼得二世已经成年（尽管6个月后才满18周岁）。被丘吉尔评论为“不得已成为南奸”的保罗亲王在得到支持者的提前通风报信后带着全家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斯洛文尼亚边境的布尔多城堡。他的专列在萨格勒布被拦下，萨格勒布的陆军司令要求火车掉头返回贝尔格莱德。保罗亲王也被带到西莫维奇的司

令部，签署了退位诏书，随后像他自己先前对待前首相斯托亚迪诺维奇那样也被送往希腊，随后被英国拘留，软禁在肯尼亚。

在贝尔格莱德，天亮之后，人们发现3月27日这天变成了兴高采烈的日子。电台宣布保罗亲王的摄政已告结束，政府已经辞职。贝尔格莱德的广场和街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人们在广场上跳舞，在街头高喊“宁要战争，不要协定；宁愿死亡，不做奴隶”。贝尔格莱德到处都挂出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国旗，高唱英国和南斯拉夫的国歌，还举着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照片游行。这次政变得到了军官、学生、所有的塞尔维亚旧政党和东正教会的支持。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渴望同德国人打一仗，他们相信他们新的统治者也会愿意这样做。同时，他们也估计到，除了一开始能打一场勇猛的阻击战外，以后恐怕只能进行骚扰性的游击战争。不过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对此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对土耳其人持续打了四个世纪的这种战争。

3月28日，年轻的彼得二世在塞尔维亚总主教加弗里尔主持下举行加冕典礼，与此同时，贝尔格莱德的“德国旅行社”——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是德国特务和煽动者的大本营——遭到了群众的袭击。德国公使冯·赫伦参加加冕典礼、从贝尔格莱德大教堂返回大使馆途中，他那辆挂有外交牌照和万字旗的汽车遭到了群众的谩骂，人们纷纷向那辆黑色奔驰汽车吐唾沫。贝尔格莱德发回来的消息令希特勒大发雷霆，特别是他此时正在接待日本特使松冈洋右的访问。希特勒气急败



南斯拉夫政变发起人杜尚·西莫维奇（1882—1962），1905年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军事学院，巴尔干战争和一战期间为参谋军官，二战前夕任南斯拉夫总参谋长，后任空军司令。1941—1942任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首相。南斯拉夫解放后回国定居，领取政府养老金，直至去世

坏地布置对南斯拉夫的进攻，以图报复，把松冈丢给了里宾特洛甫去照顾。

在整个1940年冬天，希特勒都在焦急地等待开春，巴尔干半岛的道路解冻，这样就可以发动对希腊的“马里塔”作战，先打垮希腊，然后再去解决苏联。“马里塔行动”预计要到4月1日才能开始，在这之前希特勒特别担心，当他的军队通过保加利亚进军希腊时，在德军漫长的右翼，那个不友好的南斯拉夫会有所举动。他也一直在担心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对三国公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斯拉夫对这个公约的态度。贝尔格莱德的突然政变令希特勒暴跳如雷，因为在他看来，塞尔维亚正是1914年挑起世界大战的罪魁，



1941年3月27日，贝尔格莱德市民上街庆祝推翻亲德政权

如今又胆敢对他的计划构成威胁。对于希特勒来说，他确立的任何条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撕毁条约的只能是他自己。希特勒不等德国公使馆发来南斯拉夫政变的详情，甚至在政变的消息被证实之前，就在27日召集了最高统帅部成员，向他们宣布，政变已使南斯拉夫在“马里塔行动”中成为一个靠不住的因素，这对于“巴巴罗萨行动”来说更是如此。但不论怎样，长痛不如短痛，此时发生这种政变、让南斯拉夫人暴露其真正面目，总比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时发生要好。他下定决心，一旦必要的准备工作就绪，就要把南斯拉夫完全消灭掉，既不在外交上进行探询，也不需要提交最后通牒或者任何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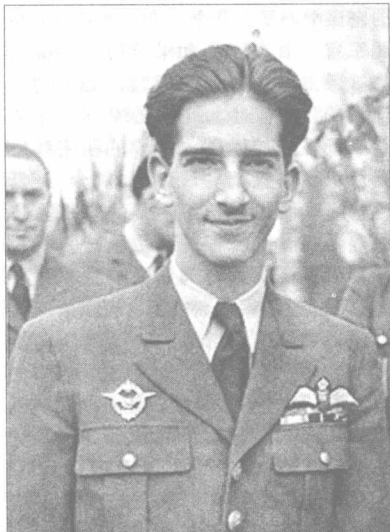
“……对南斯拉夫的打击一定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去摧毁它的军事力量。这一点在政治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样可以使土耳其人胆战心惊，并将有利于随后的希腊战役。还可以这样估计：一旦我们发动了进攻，克罗地亚人将会倒向我方。要保证他们享受适当的政治待遇（以后还有自治的权利）。这场战争一定会非常受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欢迎，因为这些国家都可能希望获得领土。意大利想要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匈牙利想要巴纳特，保

加利亚想要马其顿。

“这项计划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来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并要使用非常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垮南斯拉夫。

“因此，巴巴罗萨行动的开始日期，势必要推迟四个星期……”（《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文件汇编》第28卷，《纳粹的阴谋与侵略》）

3月28日凌晨2时，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冯·马肯森求见墨索里尼，向他透露了德国的进军计划，并要求意大利人不要折腾，只需全力保卫阿尔巴尼亚边界即可。一想到可以不必再受德国保证南斯拉夫领土完整的约束，墨索里尼就满面春风，精神抖擞。他只花了一个小时与仆从们讨论，就给柏林挂去了电话，兴高采烈地欣然接受了希特勒的命令。当天天亮之后，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草拟了一份对南斯拉夫的宣传纲要，提到德国军队不是与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穆斯林）和马其顿人作战，而是“保护这些民族免受那些为英国利益效劳的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的无谓屠杀”。非常凑巧，格拉茨的大区党总部在第二天就发来了第一份这样的电报，说3月28日，当塞尔维亚人在日耳曼人聚居的诺维萨德举行游行示威时，两名德意志人被示威者打伤。德国



彼得·卡拉乔治维奇（1923—1970），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1934—1945在位），1941年三月政变后即位，因德国入侵而被迫流亡伦敦，加入英国皇家空军，1944年在伦敦迎娶希腊公主亚历山德拉。1945年11月29日被废黜，后前往美国定居，1970年因肝硬化死于洛杉矶，安葬在伊利诺伊州自由城的圣萨瓦修道院

的报纸和电台马上开动起来，对这类“可怕的暴行”日甚一日地大肆渲染，说南斯拉夫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正在受到暴行的折磨。很难想象希特勒怎么会认为别人猜不出他的下一步意图。连最小的小孩子都能从中看出，德国马上就要进攻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的新政府也知道这一点，情况十分危急，它力图拖延时间。3月30日，南斯拉夫新政府宣布它将继续忠于三国条约。通过空军的关系，新首相西莫维奇还以个人名义给戈林元帅发去了一份意在和解的电报，同时还要求意大利人出面调停——而此时墨索里尼正在迫不及待地等待德国发给他进军命令。同时西莫维奇还发布命令，号召人民保持平静，各守岗位，不要举行游行反德游行示威、或者传播谣言。西莫维奇每天晚上都让年轻的彼得国王去王宫地下防空洞里睡觉；南斯拉夫政府宣布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为不设防城市，这表明它对时局并不存什么幻想。德国之祸马上就要降临。

棕榈星期天

在1941年3月27日的德国最高统帅部军事会议上，希特勒曾经宣称，如果天气好的话，将于4月1日发动“马里塔行动”。但是到了3月31日，最高统帅部又决定“马里塔行动”要到4月

1941年4月初，意大利第二集团军的部队在里雅斯特集结，准备入侵南斯拉夫



5 日才开始。届时集结于保加利亚西部的德国军队将向尼什方向挺进，同时以全部可用的空军力量对南斯拉夫的防空工事和贝尔格莱德进行空袭。那天希特勒写信给墨索里尼——这是他在二战当中情绪最激动的信件之一——说德国即将发动进攻。他在信中说，他明白自己将面临一个极其顽强的敌人，这个国家易守难攻，他表示相当担心，因为南斯拉夫拥有德意两国制造的飞机。他还为这次新战役增添了一些新的理由，说他得到消息，“俄国即将同南斯拉夫签订一项友好条约，也许这项条约甚至已经签订了”。

莫洛托夫在贝尔格莱德政变后主动提出与南斯拉夫订立一项军事协定，并且把这件事通报给了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伯爵。看来这是苏联挽救南斯拉夫的不多举措之一。4月5日晚间，苏南两国签署了一项协定，规定“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如遭到第三国的进攻，另一方保证恪守友好政策”。但是这个保证只是一张空头支票，甚至还不如英法在1939年给波兰的那个保证，只不过是南斯拉夫王国起了临终安慰的作用而已。

1941年4月6日，星期日，1815年塞尔维亚人发动反土耳其起义之后的又一个棕榈主日。距贝尔格莱德政变不过十天，希特勒下了手。当天清晨六

遭空袭之后的贝尔格莱德，1941年4月8日。远处为被炸断的多瑙河大桥



点半的收音机广播里，里宾特洛甫正在用粗噶刺耳的声音向公众宣告元首已下令严惩“贝尔格莱德的谋反集团”，并决定使用武力在南斯拉夫恢复“和平与安全”。里宾特洛甫宣称说，炸弹已经“像大雨一样投向了贝尔格莱德”——实际上这个预言比真实情况还早了几分钟。里宾特洛甫说这番话的时候，贝尔格莱德近郊的农民还在往星期日的早集市上走去。男人穿着暗色的衣服，妇女穿着艳丽的刺绣服装。他们走得并不急，但比平时更沉默、更严肃。除了送奶车的叮当声外，“白城”贝

尔格莱德在这个棕榈主日的清晨还笼罩在一片和平的静谧之中。

几分钟后，“像大雨一样的炸弹”铺天盖地地落在了这座和平城市的头上。从罗马尼亚空军基地起飞的德国“施图卡”俯冲轰炸机出现在贝尔格莱德淡紫色的天际。在第一波空袭中，德国空军第四航空队（Luftflotte IV）出动了330架飞机，其中74架是“施图卡”，此外还有160多架Do-17和容克Ju-88中型轰炸机，以及大约100架歼击机。讽刺的是，南斯拉夫空军拥有同样的He-111轰炸机和Bf-109战斗机，这是在两国关系恶化之前从德国引进的，因此驻扎在伏伊伏丁那平原和多瑙河沿岸的南斯拉夫防空部队以为飞来的是本国飞机，没有开炮。直到七点差一刻，贝尔格莱德才响起了空袭警报，负责保卫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空军第32和第51大队派出六个中队的Me-109和“飓风”战斗机进行拦截，驻扎在南斯拉夫中部的第31和第52大队也派出四个中队的增援力量。根据南方的资料，击落12架德机，南斯拉夫方面损失20架，重伤15架。德国飞机的空袭取得了成功，4000多名贝尔格莱德市民葬身于瓦砾之中。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这场代号为“惩罚”（Operation Strafgericht）的空中战役从未间断对贝尔格莱德的空袭。每隔两到四个小时，就有一百多架俯冲轰炸机和水平轰炸机从罗马尼亚西部的蒂米什瓦拉和阿拉德空军基地起飞，飞越多瑙河彼岸的平原，向贝尔格莱德飞来。“施图卡”以可怕的准确性炸毁了南斯拉夫政府各部的办公楼、通讯设施和军事指挥中心，水平轰炸

德国俯冲轰炸机空袭贝尔格莱德，1941年4月6日（德国《信号》杂志5月2日号图片）



贝尔格莱德市区被炸毁的桥梁



空袭中被毁的贝尔格莱德新王宫（彼得二世住所）



贝尔格莱德火车站被炸毁的列车

被炸毁的贝尔格莱德居民区高层住宅楼



机则不怕来自地面的反击，擦着屋顶飞过，对居民区进行了地毯式轰炸，许多人被炸死在自己的屋子里。在黄昏降临之际，德国轰炸机还扔下了许多燃烧弹，以便给夜间来袭的轰炸机提供指引。

到4月8日终于恢复平静时，人们从贝尔格莱德的废墟中挖出了17000具尸体，医院里躺满了5万多名伤员。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老王宫（1903年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末代国王就是在这里被枪杀的）和王室居住的新王宫都被炸毁；国家歌剧院、贝尔格莱德市政厅、圣萨瓦医院和贝尔格莱德大学也挨了炸弹。塞尔维亚国家图书馆被大火烧毁，30万册藏书，包括许多珍贵的中世纪手稿和善本，全部被付之一炬。这场硝烟弥漫、火光烛天的噩梦过去之后，从贝尔格莱德动物园被炸毁的笼子中跑出了各种各样惊恐万状的动物。一只受伤的鹤鸟一跛一跛地走过烟火正浓的贝尔格莱德最大旅馆。一头茫然凝视、莫名所以的熊，迈着缓慢而笨重的步子，蹒跚地经过这个地狱般的场所走向多瑙河。在欧洲，它并不是仅有的一只茫然不知所措的熊。

除了筋疲力尽的希腊和遥远的英国之外，南斯拉夫别无其他盟国。而英国即使有美国的援助，在三年之内也未必能返回欧洲大陆。斯洛文尼亚面临着德军从施蒂里亚、意军从威尼斯朱利亚发动进攻的威胁；克罗地亚只有德拉瓦河可以作为屏障；塞尔维亚也只有多瑙河可以据守。希特勒所担心的难以对付的地区，只有波斯尼亚、黑山和马其顿。许多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早就渴望同德国人打一仗，有不少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则和他们同仇敌愾——特别是在南斯拉夫海军中。克罗地亚人在海军中比在陆军中有地位。可是，南斯拉夫军队的装备实在糟透了，其总参谋部又被一些因循守旧的旧军官控制着，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和土耳其人打仗的阶段，嘲笑使用机械化装备就不像军人。

1941年的南斯拉夫王国武装部队由陆军、海军和空军组成。陆军的总兵力有120万人，包括28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还有35个独立旅，其中16个部署于要塞，另外19个（包括三个山地旅）是机动作战部队，每个旅包括1至3个步兵团、1至3个炮兵营。在德国人发动进攻的时候，南斯拉夫陆军还没有完成动员——这主要是摄政王害怕激怒德国人而贻误时机所致——部队的兵力满员程度只有70%到90%。所有的陆军部队被编为三个集团军、一支海岸防御部队和一支战略预备部队，其编成如下：

第三集团军下辖第三军（4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第三本土防卫军（3个步兵师、1个摩托化炮兵团），第五军（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2个混成旅、1个摩托化炮兵团），以及第六军（3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两个王家近卫团）。这个集团军实力最为强大，部署于南方，警戒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边境。

第二集团军下辖第一军（1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3个旅、6个边防团）和第二军（3个步兵师、1个边防团），部署在北方，警卫从多瑙河“铁门”直到德拉瓦河的地区。

第一集团军包括第四军（3个步兵师和1个旅）以及第七军（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3个山地旅、2个步兵旅和9个边防团），这个集团军的部队大多数由克罗地亚人组成，根据“斯波拉宗”协议部署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境内，负责警戒北方同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国境。

南斯拉夫海岸防御部队主要部署在扎达尔（意大利领土）附近、科托尔和希贝尼克三地，包括1个步兵师和2个

独立旅，此外还有防空部队和海岸要塞部队。

南斯拉夫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部队部署在中部多山的波斯尼亚地区，它包括4个步兵师、4个独立步兵团、1个坦克营、2个摩托化重炮营、2个摩托化工兵营、15个独立炮兵营和2个防空营。

当时南斯拉夫王家陆军装备有7000多门火炮，其中3000多门是一战时代留下来的老式火炮，用马拖曳；另有4000多门较新、较现代化的火炮，20年代和30年代订购自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的多家军火上，不过其中大多数来自捷克的斯科达兵工厂，其中包括800门反坦克火炮、1900门迫击炮和250门防空炮。南斯拉夫的机械化部队包括6个摩托化步兵营，附属于三个骑兵团，此外还有2个摩托化工兵营和6个摩托化炮兵营，用德国和法国制造的卡车牵引火炮——战争爆发前夕，还从美国进口了1000多辆卡车。南斯拉夫的装甲部队少得可怜，只有两个坦克营，其中一个配备老得掉牙的雷诺FT-17坦克，另一个配备稍微现代化一些的雷诺R35轻型坦克（54辆），还有一个附属连，配有8辆捷克生产的SI-D坦克歼击车。

南斯拉夫王家空军（JKRV）在“棕榈主日”那天表现不佳，这主要也应归结于装备不良。它在德国人入侵时拥有450架飞机，编为22个轰炸机中队和19个战斗机中队，绝大多数飞机购自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其中主要的机型包括73架梅塞施密特Bf-109E战斗机、38架英制霍克“飓风”I型和30架“狂怒”II型战斗机、60架多尼尔Do-17K轰炸机、60架英制“布伦海姆”轻型轰炸机、还有购自意大利的40架萨伏亚·马切蒂SM-79K轰炸机。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6架洛克希德L-10“伊莱克特拉”、3架英制“斯巴达人”和1架德哈维兰“龙”式客机在德国入侵之后被紧急征用，用来运输政府要员。南斯拉夫海军航空兵拥有12架德制Do-22和15架南斯拉夫自己生产的罗戈扎尔斯基SIM-XIVH型水上飞机，主要当作巡逻机使用。南斯拉夫在30年代初设计的“伊卡鲁斯”IS-2型双翼战斗机既老又慢，开战时只有8架。1936年设计的IS-3型双翼战斗机在开战时生产出12架，其中只有6架可用。

从4月6日到4月17日（南斯拉夫最高统帅部宣布投降）这11天里，南斯拉夫王家空军在保卫领空的战斗中被消耗殆尽。以它的60架Do-17K轰炸机——1938年秋天连同生产许可证一道从德国购买的——为例，这些飞机在开战第一天就被炸毁了26架，剩余的34架则勇敢地对向南斯拉夫境内纵深推进的德军纵队和保加利亚境内的空军基地发动了攻击，在行动中损失14架，另有19架在地面被德国俯冲轰炸机炸毁，只有一架幸存。

位于克拉利耶沃（Kraljevo）的南斯拉夫国立飞机制造厂在4月6日至17日期间生产出了6架Do-17K（在这十一天中，克拉利耶沃飞机厂还抓紧组装出了8架“飓风”、4架“布伦海姆”、2架IS-2、1架IS-3和1架Bf-109），最后一架是在4月12日该厂沦陷前夕由试飞员直接驾驶着逃走的。这6架抢造出来的Do-17，连同战前那些同型飞机中的最后一架，撤退到黑山的尼科希奇空军基地，把逃亡到那里的彼得二世国王和政府要员送到希腊，随后又与南斯拉夫空军的SM-79轰炸机和征用的“伊莱克特拉”客机一道把南斯拉夫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抢救到希腊。在这个过程中，又有5架Do-17在希腊的机场上被意大利空军炸毁，只有两架最终逃到埃及，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

南斯拉夫陆军一辆被摧毁的雷诺RT-17坦克，1941年4月15日



南斯拉夫王家空军的霍克“飓风”战斗机



南斯拉夫王家空军的伊卡鲁斯IS-2战斗机。伊卡鲁斯飞机厂位于贝尔格莱德市郊的泽蒙，除了生产IS型飞机外，还负责组装“多尼尔”、“梅塞施密特”、“布伦海姆”、“霍克”等进口飞机

4月15日下午4时，赫尔曼·戈林命令第四航空队司令亚历山大·勒尔上将停止对南斯拉夫的空袭，转而投入希腊战役。可以说，到这时为止，南斯拉夫王家空军已不复存在。德军在南斯拉夫战役结束后缴获了300多架飞机，其中由克拉利耶沃飞机厂继续组装的6架Do-17交给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得到了6架“飓风”和6架“布伦海姆”，芬兰空军分到了20架半组装完毕的“布伦海姆”和全套配件，其余的整脚飞机则交给了“克罗地亚独立国”的空军。

“南斯拉夫委员会”在1918年奥匈帝国投降时曾接收了后者的全部主力舰，但意大利人卑劣地偷偷击沉了其中最强大的无畏舰“联合力量”号，《圣日耳曼和约》又把其余的主力舰分配给了英、美、法、意等国，塞尔维亚只分到了12艘鱼雷艇、4艘扫雷艇、4艘内河炮舰和几艘小型辅助舰艇。随后组建的南斯拉夫王家海军规模不大，只担负沿岸警戒的任务。1925年，南斯拉夫以低价从德国购买了舰龄长达26